

責任編輯：管樂

印爆日本腦炎 近500童喪命

【本報訊】綜合中央社、《印度時報》9日報導：日本腦炎肆虐印度北方省、阿薩姆省，過去兩個月共傳6570宗感染案例，奪走至少490名兒童性命，且疫情有蔓延趨勢。

日本腦炎疫情肆虐印度北方省東部地區，過去兩個月已傳4480例感染，幾乎是去年同期的兩倍，奪走至少376名兒童性命。其中，疫情最嚴重的戈拉克普爾縣，今年已有超過300名兒童死亡。

疫情同樣嚴重的阿薩姆省，今年通報案

例達2090例，包括114例兒童死亡案例。光是希巴薩格爾縣就有42例死亡案例。

令人憂心的是，疫情有悄悄蔓延的趨勢，新德里和昌迪加爾最近也紛紛傳感染案例。

北方省政府先前曾多次發函要求提供疫苗，中央政府卻遲遲未採取行動，導致疫情擴大。儘管疫情早在雨季期間達到高峰，疫苗卻遲至8月底才分配到疫情嚴重地區。

「新德里電視台」9日報導稱，北方省過去兩波疫苗接種分別是在2006年及2010年，

專家認為，這樣根本不足以抑制疫情。中央政府今年1月對北方省政府承諾的660萬劑疫苗，迄今沒有下文。報導認為，中央政府的忽視導致嚴重疫情。

印度全國保護兒童權利委員會已發函北方省政府，強調日本腦炎奪走孩童性命的嚴重事件，已違反兒童生存發展權，要求15天內提出報告。兒童權利委員會說，他們要當地政府統計出今年感染腦炎兒童的確實數目，並且檢討省府的應對措施。他們也要求當地政府加強水源的清潔，避免腦炎繼續擴散。



▲腦炎肆虐印度，已經奪取至少490名兒童性命 資料圖片

無公職好友參與國防 「特別顧問」陪同外訪 英防長濫權 卡梅倫促查

【本報訊】綜合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、《每日郵報》網絡版9日報導：英國國防大臣霍理林被指擅自允許不具公職的好友參與國防事務，面臨調查。首相卡梅倫8日要求進行速查，要求霍理林在周一前提交報告解釋。

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披露，霍理林的好友亞當·韋里提自稱國防大臣特別顧問，參與到國防部敏感事務中來，但實際上他並無官方職務。

卡梅倫尷尬轉軼

事情爆發後，霍理林在第一時間作出否認，並於上周五委託國防部有關部門展開調查，調查過程預計為期兩周。

首相卡梅倫一開始也表示對霍理林「完全信任」，但他在短短數小時後便轉軼，要求內閣秘書就此事盡快展開調查，並限定霍理林在周一前提交報告，而不是等待預計兩周後才出爐的國防部內部調查報告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卡梅倫立場發生變化，是想盡快控制局面，以免事態擴大。

34歲的韋里提是霍理林的室友。在2005年霍理林的婚禮上，韋里提還是他的伴郎，兩人私交非常好。

今年6月，韋里提安排一家通訊公司在迪拜與霍理林會面，商談由該公司提供阿富汗英軍與國內通話設備的事宜。正在利比亞訪問的霍理林解釋說，迪

拜的會談是「很意外的巧合」。他與廠商剛好都在同家餐廳用餐，軍火商代表要求雙方坐在一起說話。當時他準備飛往阿富汗，中停禮拜休息。不過他表示，公眾對此「巧合」存在疑問，可以理解。

進出國防部無需安檢

此外，霍理林還被指允許韋里提陪同他出差。在他擔任國防大臣的16個月裡，韋里提14次進出國防部大樓，並且沒有經過必要的安全審查，也曾多次以「顧問」身份陪同霍理林出國。韋里提自稱是霍理林的特別顧問，並將這一頭銜印在國防部的官方名片上。據悉，英國內閣大臣任命特別顧問需按有關規定進行，而且須得到首相的正式批文。

《觀察家報》在網站張貼影片片段，畫面顯示2010年，韋里提獲准出席霍理林與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在倫敦的會議。除此之外，韋里提早在2007年便以顧問的身份伴隨霍理林到達迪拜，2009年在以色列出席安全會議。今年夏天他再次在斯里蘭卡出現，當時霍理林



▲韋里提(右)是霍理林(左二)婚禮的伴郎 互聯網

▶韋里提(右)今年陪同英國國防大臣霍理林(中)訪問斯里蘭卡 資料圖片

正在進行官方訪問，而韋里提出現在霍理林與斯里蘭卡官員的合照中。

在野黨工黨日前表示，霍理林要求進行的內部調查是驚慌的反應，並要求霍理林立即向議會說明此事。



迪拜安排廠商與防長會談 韋里提「真的像顧問」

34歲韋里提的商務名片上印有英國國會的標誌，並自稱為霍理林的「顧問」。在今年4月1日他就向霍理林引見了英國普騰公司老闆哈維·博爾特，比外界認為的時間早得多。

博爾特是普騰集團的行政總裁，他想跟國防部的人士說說自己公司與美國集團3M的官司，以及公司生產的兩項名為Acolyte和Cellcrypt的產品。Cellcrypt可用於保護英軍在阿富汗的通訊。

常駐迪拜的博爾特稱他是通過一家名為Tetra策略的英國游說公司跟霍理林見面的。他說：「Tetra首先通過電子郵件向我推薦了韋里提。他4月1日到迪拜的時候，我到香格里拉酒店去見他。他似乎是為了其他生意到迪拜來。我們在大堂聊了大概一個小時，討論Acolyte跟Cellcrypt。在我差不多離開的時候，他把我介紹給霍理林。」

英國外交部辦公室稱霍氏的迪拜之行是為了會晤迪拜酋長謝赫·穆罕默德·本·拉希德、阿勒馬克圖姆。現在未知韋里提到迪拜的旅費由誰支付，Tetra和博爾特均不會為韋里提在迪拜的任何會議提供經費。

博爾特說：「韋里提6月再次抵達迪拜，他安排了我跟霍氏的會議，並把Acolyte跟Cellcrypt作為議程。就是那個時候他向我出示名片，自稱霍理林的顧問。那看起來非常正式，我沒理由不相信他是霍氏的顧問。而且他顯然是認識霍氏的，因為在4月份第一次向他介紹我，以及6月香格里拉會議時，他倆都挨著坐。」

該次會談在6月17日舉行，持續了45分鐘。國防部稱霍氏當時在阿富汗訪問英國駐軍後中轉迪拜，沒有按照慣例在當地大使館停留，而是選擇下榻一家沒有經過國防部安全檢查的新酒店。韋里提當時只是碰巧同在迪拜，並非霍理林官方隨行之人。

博爾特本月8日稱，當他發現韋里提並非他所謂的時候感到驚訝，「我以為他是霍氏國防部的顧問，為國防部所聘。最近得知他其實不是，並沒有經過安全檢查時，我非常擔憂。開會時他就坐在國防大臣旁邊，討論語音加密技術，看起來完全是國防部的一個顧問。如果早知他沒有經過安全檢查，我們就不會透露那麼多信息，我覺得霍氏應該為此負責。」

霍理林8日晚作出澄清，稱6月17日與博爾特的會面純粹是巧合。他說，「他們碰巧坐在飯店相鄰的座位」所以才有了那次會面。對此博爾特表示：「確實是我碰巧在餐館裡遇到韋里提時才敲定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，但與霍氏會面的計劃以及討論的內容早在4月1日時就安排了。」

(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)

韋霍形影不離如孖生兄弟

英國國防大臣霍理林與韋里提的友誼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，當時霍理林是反對派的蘇格蘭事務發言人，韋里提則在愛丁堡大學修讀公共政策。

當時，霍理林年近40，是保守黨右翼一顆冒起的新星。比霍理林年輕17歲的韋里提未婚，長得遠比霍理林高。但這兩個人對政治和美國有興趣，如今也對周遊列國有興趣。

韋里提畢業後在一家保健公司工作。他在倫敦住過很多地方，而且在塔橋附近霍理林的單位和他同住，直至這位資深保守黨人2005年與蘇格蘭醫生貝爾德結婚為止(現在有消息指韋里提當年住在這個單位時毋須交租)。韋里提更

擔任霍理林婚禮上的伴郎，再次顯示兩人私交甚密。

霍理林後來安排韋里提擔任他成立的慈善機構Atlantic Bridge的行政總監。這個機構由保守黨捐款人欣策資助，把英美兩地的右翼政界人士組織起來。這個職位令韋里提短短3年就賺得9萬英鎊，也讓他不時到美國參加研討會和會議。

韋里提堪稱是霍理林的「影子」，不但和他一起出國訪問、開會，還會到倫敦的政府辦公室探望他。衣着分析員說，這兩人關係的親密程度，還可以從衣着反映出來。韋里提和霍理林已多次在不同場合被拍下穿上服裝式樣相近的照片。

最令人震撼的例子，是兩人近期訪問斯里蘭卡時被拍下的一張照片。當時兩人都身穿藍色西褲配黑皮帶、白色開領襯衫，和淺啡色的西裝襖。兩人雖然相差17歲，但他們對衣服的選擇卻格外貼合。

行為及身體語言專家詹姆斯說：「當人們開始互相走近、友善相待，外觀往往都傾向越來越相像，連他們擺出的姿勢和衣着方式也不例外。從這個個案來看，這兩個人彷彿要向全世界宣布：『我們是朋友。我們的思想方式接近，而我們相敬如賓。』而且，他們不但姿勢一樣，就連面部表情也是一樣的。」

(英國《每日郵報》)



▲韋里提(右)與霍理林(左)私交甚好，穿着都相近 互聯網

英催化三民主義思想形成

踏訪中山海外足跡之 20

1896至1897年，孫中山先生在英國不到一年的時間，是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形成的時候。在英倫所見所聞使他首次認識到，歐洲多國政府得到了權力和財富，但沒有能夠帶給人民幸福快樂。

孫中山在他的《孫文學說》裡是這樣描寫的：「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

國家富強 工人階級未得益

19世紀末英國經歷了維多利亞統治下的全盛時代，工業、貿易居全球之首，也

設立了議會選舉、政府、文官、司法等等制度，英國社會正興起男女平等、種族平等新思潮，上層社會追求變革的氣氛濃郁。

孫中山到英國不久便經歷了倫敦蒙難。他的獲釋，雖然說得到了康德黎等英國朋友幫忙，但最終還是由於英國媒體輿論對政府構成壓力，英政府要按章執法的結果。

蒙難事件使孫中山對英國民主權利有了深切的體會。他在倫敦蒙難獲釋後，向英國多家報社致感謝信，表達他對民主的欣賞。信中有這樣一段話：「這(事件)使我深深認識和感受到，什麼是憲制政府，什麼是受過教育的人民。我將在我深深熱愛着的，但又受着壓迫的祖國，盡快提倡教育和文明。」

在倫敦生活期間也使孫中山看到了，英國的富庶只屬於上層社會階層，人民仍然極之貧窮。英國工業革命後，作為當時的「世界工廠」，勞工階層一無所有，窮人生活沒有保障，勞資矛盾日益尖銳。其時英國工人階級已經形成，一些替工人階級說話的黨派醞釀結盟，聯合起來為勞工爭取福利。這都使得抱着救國救民之心的孫中山深刻理解到，人民福祉和權利與民族復興息息相關。

19世紀也是歐洲中產階級自由主義思

潮冒起的時期，據知孫中山老師康德黎夫婦都是自由主義的支持者。他們主張社會改良改革，支持言論、集會、出版自由，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但是，孫中山注意到，這一思想潮流並沒有提出經濟地位的平等。

孫中山在1912年《我的追憶》這樣寫道：「在倫敦被釋放之後，我留下來研究歐洲政治活動，與英國政界人士結交，這使我大開眼界。我首次明白到，雖然歐洲政府享有權勢財富，但這並沒能造福人民大眾。因此，歐洲有識之士們仍然尋求社會革命。我現在希望通過一種努力，一個長久的計劃，同時地解決社會、民族、民主等等問題。我提倡的三民主義完全符合了這一目標。」

讓西方了解中國實情

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主張在更趨完善之際，留英期間他除了研究英國社會，廣泛交際賢人達士，發動華僑為中國革命籌款，還注意讓西方了解中國實情，爭取英國各界支持中國革命。

1897年3月1日的英國《半月刊》雜誌發表了孫中山的文章，題為《中國的現在和將來》。他還在同年7月的《東亞》雜誌上撰文，講解《中國的司法改革》。

康德黎的日記也記錄了孫中山曾先後在牛津和倫敦講學，其中包括1897年3月11日在倫敦聖馬丁教堂為查寧十字醫院慈善籌款演講「中國的事」。康德黎協助了孫中山這次演講，日記形容這是吸引人的

一個晚上，260人參加。英國報章和1897年3月23日的《紐約時報》都報道了孫中山的這次講話內容。

《紐約時報》的報道記錄了孫中山的一段話：「許多人都知道中國遭受饑荒、水災、病疫，人民生命財產沒有保障。但是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，中國人民受的苦楚，是政府官員貪污的結果。」

該報說，在向聽眾簡介了中國歷史之後，孫中山在演講中列舉了許許多多軍閥受賄、官僚腐化的例子。

該報還引述了孫中山的話指：「中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變革，許多有識之士願意投身公共事務。西方政權總是設法保護現行中國政府，這其實是錯誤的。應該支持我們，支持我們掌握權力，支持我們成功，支持我們推翻滿清，同時，還應該阻止外國入侵中國，外國也不要干預中國革命。」

孫中山在離英前夕，曾於《地球報》發表告別書，講述他在英國的感受，再次感謝英國上下對他和對中國革命的支持。



▶大英博物館是孫中山在倫敦期間經常流連的地方 互聯網